

■马克思主义哲学

美国“文化的唯物主义”及其理论走向

何 萍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何 萍(1953-), 女,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哲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 要] “文化的唯物主义”是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形态。它是沿着两种不同的思路建构起来的: 一种是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成果, 在经济和日常生活层面上, 建立经验的文化哲学; 一种是汲取欧洲“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 在语言意义和意识形态层面上, 建立批判的文化哲学。本文着重考察这两种思路在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和对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文化阐释上的不同观点, 揭示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多元理论走向。

[关键词] 美国哲学; 美国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 文化哲学; 文化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 B7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4)02-0191-09

在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文化哲学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文化哲学以文化哲学为一种思维方式。它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各个方面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之中。在这个意义上, 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可统称为文化哲学。狭义的文化哲学被美国学者称之为“文化的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 主要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在这里, 我们取狭义的文化哲学。

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采用“文化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 旨在建立一种不同于苏俄“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学说。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是明确提出“文化的唯物主义”概念的学者。他在提出这一概念时强调, “文化的唯物主义”力图建立一种更好的科学理论, 以有效地理解和揭示造成社会与文化之间差别和同一的原因, 即社会文化(Social culture)现象的原因。因此, 这种理论一开始就与流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相对立。认为流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庸俗的唯物主义”或“机械的唯物主义”。它以黑格尔的观念的矛盾辩证法构造体系, 在方法论上强调决定论, 在理论上以理念、崇高的道德价值、审美的和宗教的信念去理解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之不同, “文化的唯物主义”立足于现代人类学的发展, 阐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尤其是马克思以生产方式、国家、法的观念、艺术和宗教观念等代替维科的“诗性”概念说明人类历史原因的思想, 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学说。这种学说在方法论上强调人类活动的非决定论, 在理论上更重视民族、国家、利益、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相互作用、人类利益的冲突和协调、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功能和动力等概念。哈里斯的这一说明从理论结构和研究范式上把“文化的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区分开来: 在理论结构上, “文化的唯物主义”以人的文化活动为核心范畴构造历史唯物主义, 而“辩证唯物主义”是以人们的社会物质条件为核心范畴构造历史唯物主义; 在研究范式上, “文化的唯物主义”把社会与文化看做是两个既相互联系, 又相互否定的范畴, 并通过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否定关系建立人类活动的辩证法, 从而走向人类活动的非决定论, 而“辩证唯物主义”则坚持以自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 导致了人类活动的决定论。在这两个方面, 哈里斯强调研究范式的建构是更为重要的方面, 因为理论的建构只有通

过研究范式的建构才是可能的,并且研究范式的建构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的建构。

事实上,哈里斯的这些思想普遍存在于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之中,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约翰·布莱克曼(John Brenkman)、阿尔伯特·丹米柯(Albert D'Amico)、路易斯·杜帕(Louis Dupre)、卡罗·古德(Carol C. Gould)等都已分别在建构“文化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哈里斯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他自己都坦诚:“‘文化的唯物主义’并不是我创造的,我只是给了它一个‘名称’”^{[1][2]}(P.26)。但是,哈里斯毕竟是明确提出“文化的唯物主义”概念的人,他把理论建构和研究范式的建构作为“文化的唯物主义”建设的两个方面,为我们厘清美国“文化的唯物主义”的研究线索提供了一条清晰的思路。这也应看做是他的一大贡献。

一、研究范式的重构

美国哲学家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时,普遍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问题,因为,研究范式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如何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问题。在这方面,哈里斯、詹姆逊的工作是值得重视的。他们研究的共同点是较系统地梳理了当代哲学和人文科学的成就,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思维方式作了专门的探讨,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由于研究领域不同,哲学思想来源不同,他们建立的研究范式也不同:哈里斯主要吸取当代文化人类学的成就,提出了“研究策略”,詹姆逊从文学的角度反思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辨辩证法和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成就,提出了“文化的批判方法”。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又生动地反映了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的不同走向。

1. 哈里斯的“研究策略”

哈里斯提出,社会文化现象不同于无机界和有机界的物质运动,无机界和有机界的物质运动是受决定论支配的,而社会文化现象是受非决定论支配的。文化唯物主义以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必须坚持人类事件的非决定论,为要坚持这一点,首先要打破研究范式的预设性。他认为,库恩的“范式”、霍尔顿的“论题”、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劳丹的“研究传统”和马克斯韦的“行动计划”,或者是一些有意识的说明,或者是一些先于观察和经验的规范,其本质上都是一些方法或范式的预设主义,因此,文化唯物主义不能沿用这些范式,而应该建立一种非决定论的范式,这种范式就是“研究策略”(research strategy)。

关于“研究策略”,哈里斯给出了两个定义:其一,以理论或规则的形成趋势定义“研究策略”。所谓“研究策略”,就是一套正被讨论的准则的谋划。一个科学的“研究策略”是指这样一套清楚明白的准则,这些准则不是一些现存的规定,而是处在待研究的不确定的认识状态之中,是一些有可能展示变化的合法的关系或原则,是一些由策略本身提出的、正在形成中的相互作用的理论主题。这一定义旨在从认识论上消除库恩、霍尔顿、拉卡托斯、劳丹、马克斯韦等研究范式中的理论或规则的现存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研究方法或范式的预设主义;其二,把“研究策略”归于经验科学。在哈里斯看来,文化唯物主义研究社会文化,不是像一般科学那样只考察社会文化的形成条件,而是考察社会文化的理想目标,以此说明社会文化的差别与同一在全球系谱中的起源、存在和变化。为要实现这一目标,“研究策略”就要把自身置于经验科学的层面,历史地探讨人们的文化创造活动,并且把说明的目的严格地限制在人们活动的理想目标上,而不是像库恩、霍尔顿、拉卡托斯、劳丹、马克斯韦等哲学家、思想家们那样,把人们的科学活动设置于认识范式之中,要求现实的科学活动去符合那些已经规范化了的“理性”。这样一来,哈里斯就从他的“研究策略”中消除了活动的预设主义,从而把认识规范从理性的科学转变成经验的科学。

在提出“研究策略”的上述两层定义后,哈里斯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识的思想。在他看来,马克思、恩格斯以决定人们存在的物质条件研究社会文化现象,揭开了由于交换活动而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的意识幻觉,从而把人们的全部社会活动归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一思想是文化唯物主义建构“研究策略”的基础。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是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谈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所以,使用了“现实的”(real)和“非现实”(unreal)的范畴。但是,认识论不是要解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这两种现象是现实的还是不现实的问题,而是要解决

人们如何能够区分和有效地获得关于这两大社会现象的知识的问题,为此,认识论的研究就不应该使用“现实的”和“非现实”的范畴,而应该使用思维(mental)和行为(behavior)、语位学(emics)和语音学(etics)、观察者(observer)和参与者(participant)这三对基本范畴。文化唯物主义的“研究策略”就是由思维和行为、语位学和语音学、观察者和参与者这三对基本范畴构成的复杂的活动系统。

在这三对范畴中,思维和行为是最基本的社会文化现象。思维以思想(thought)和情感(feeling)的形式体现人类精神的经历;行为则以人的身体的运动和与前人创造的环境相互作用的形式体现人的社会活动。对于这两类现象,认识论的研究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定义为主观与客观,或主体与客体,因为,思维和行为还分别有参与者和观察者之分,不仅如此,参与者的思维和行为与观察者的思维和行为都可以是客观的。所以,为了避免因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范畴而引起的混乱,人类学家引入了语位学和语音学的范畴,以语言的意义和语音,或语言的功能和材料来说明思维和行为。哈里斯指出,语位和语音与思维和行为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互相交错的关系:语位学可以用于考察思维,形成语位/思维关系,亦可以用于考察行为,形成语位/行为关系,语音学也可如此而形成语音/思维关系、语音/行为关系。这四重关系就是“研究策略”中的最基本的关系。

在如何看待语位和语音、思维和行为的意义,那些强调语位学意义的学者,都重视语位和思维。哈里斯并不否认语位学对于理解一种文化现象,特别是对于理解不同文化现象、跨文化现象的意义,但是,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语音的研究是无意义的。事实上,不论是就一个社会文化系统的构成而言,还是就社会文化的连续性发展而言,语音都比之语位更为重要。因为,作为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基础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就是人们的语音行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结构,即家庭经济,也是语音行为,而位于社会文化系统的上层结构的行為的上层建筑,如艺术、音乐、文学、广告、体育、游戏、科学等,还是语音行为。语位和思维的各种形式,如种族、生存的经验知识、氏族、政治意识形态、伦理学的和民族的意识形态、符号、审美标准、哲学、认识论、巫术、宗教等,不过是基础结构、结构和上层结构的语音行为的不同功能,尽管它赋予了语音结构以特殊性,展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但它只有以语音行为为其实体才能展示其意义存在。所以,文化唯物主义“研究策略”的主要原则,就是强调语音和行为的条件和过程的策略先于语位和思维的条件和过程的策略,基础结构的条件和过程的策略先于结构和上层结构的条件和过程的策略。当然,这并不否认语位、思维、上层结构、结构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性^[1](P.26)。

哈里斯提出的“研究策略”的主要原则突出了他引入文化人类学的语位学和语音学概念说明思维和行为认识论意义的目的:他不是要建立一种新的辩证思维方式去对抗苏俄“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方式,而是通过语音的分析,把文化唯物主义置于人类日常生活的经验之中,从而建立起一种经验的思维形式,以此否定苏俄“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形式。

2. 詹姆逊的“文化的批判方法”

詹姆逊的“文化的批判方法”恰好与哈里斯的“研究策略”呈反向。詹姆逊并不否认社会的经济结构,或基础结构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原理,但是,他认为,这一原理只是开展文化批判的思想前提,真正的文化批判只有在上层建筑的语境中,只有进入意识,才是可能的。因此,“文化的批判方法”的指向应该是人的自由的自我确认,是把人从物质生活的压抑和日常生活的平庸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在文化批判中,就是形式对内容、价值对实体、语位对语音的否定。从这一指向出发,詹姆逊把“文化的批判方法”策略的建构集中在文化的形式、语位方面,“形式”也由此成为“文化的批判方法”的核心概念。

在詹姆逊那里,“文化的批判方法”包括历时性策略和共时性策略。历时性策略相对于一种文化系统而言,共时性策略相对于不同文化系统而言,两者分别在辩证思维和语言模式中获得其建构。

辩证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否定性思维。辩证思维的这一本性早在黑格尔那里就已经确立了。黑格尔强调辩证思维否定性的原意是要建立人类精神自我批判和自我发展的原则,但是,由于他把否定性限制在他的形而上学体系之中,又最终把否定性变成了实现他的哲学体系的工具和环节,窒息了否定性应有的批判性和发展的无限性。为了走出黑格尔否定辩证法的内在矛盾,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家们尤其重视对否定性概念的研究,都力图通过重新阐发否定性而发展辩证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众多阐释中

的一种。不仅如此,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对否定性的阐释也各不相同。在苏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否定性被用于说明历史的必然性,这一说明揭示了否定性中所包含的历史内涵,却消解了否定性中的精神的自我批判性,而这一点恰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得到了阐发。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坚持辩证否定的自我批判性,并赋予否定以人的存在本体论的意义。詹姆逊从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形式主义”立场出发,采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对否定性所作的精神和意识批判的解释,但是,他却没有像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那样把否定性作为哲学的本体,解释成人的形而上学的内容,而是把它严格地限定在方法论的策略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在其结构上拒绝体系,抑或拒绝仍然是同一回事的形而上学内容”^[2](第 306 页),任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企图,都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从这一观点出发,詹姆逊从三个方面揭示了辩证思维的否定性的基本内容:其一,辩证思维的否定是在形式的意义上被定义的,否定就是人的主体的解放过程,亦是自我意识的确立过程;其二,辩证思维的否定是对现实事物的抽象,是在更高的层面上把先前的问题纳入到新的思维之中的方式。只有通过这种否定,思维形式才能不断获得建构,意识才能发生变换,才能达到自觉超越;其三,辩证思维的否定本身是反系统化、反形而上学化的。正是由于这一特点,辩证思维才成为一种“永远达不到系统真理的某种终极地点”^[2](第 315 页)的意识运动。这三个基本内容即是“文化批判方法”的历时性建构。

詹姆逊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而言,仅有历时性建构是不够的。因为单纯的历时性建构会把文化批判封闭在意识中,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本质上是实践的,它必须走向现实、领悟现实,所以,“真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典型姿态,发生于共时性的领域”^[2](第 319 页)。这就提出了在方法论上建构共时性策略的问题。

在共时性策略的建构上,詹姆逊充分吸取了语言学,尤其是索绪尔语言学的成果。索绪尔语言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区分了语言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突出了共时性研究的意义,并以语言结构的研究揭示出语言个体之间的关系、语言与其存在之间的关系。詹姆逊对索绪尔的这一研究方向作了充分的肯定:“索绪尔的出发点不止是一种反抗,它同时也是思想上的大解放。……索绪尔的创新就在于他坚持认为语言是一个有系统的整体,任何时刻都是完整的,不管其内部在片刻之前发生过什么变化。……也就是说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永远是此时此刻的存在,每一时刻都蕴涵着产生意义的一切可能。”^[2](第 4 页)这一评价充分体现了詹姆逊研究索绪尔语言学的重心在于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的内在构造,尤其重视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的双项对立结构理论。但是,詹姆逊是从他的马克思主义“绝对形式主义”的立场评述索绪尔的语言学,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把索绪尔的共时性理论由语言学提升为哲学的方法,把索绪尔的双项对立结构纳入到辩证思维之中,转换成文化批判的共时性建构。这样,詹姆逊就把对索绪尔语言学的评述转变成了对他自己的文化批判的共时性策略的论述。概括起来,詹姆逊的论述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两项对立结构仅仅限于语位学的研究,语言和言语的对立是语位系统中的对立,因此,两项对立结构本质上是一个符号意义系统。符号的任意性使两项对立结构能够打破自然语言的局限,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广泛地运用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批评和哲学等学科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项对立结构可以作为一种普遍思维方式加以研究;其二,两项对立结构中的双方对立是辩证的关系,对立的双方都依赖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没有一方,另一方也不存在。这种辩证关系与有和无、正和负的对立具有同样的辩证意义。因此,两项对立结构体现的这种辩证关系绝不是一个语言的问题,而是一个逻辑的问题。这种逻辑在现存世界中是事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在思维上是思维的逻辑;其三,由于两项对立结构存在于语言中,因而突破了旧的认识论界限,将被旧的认识论贬到非理性层面中的情感、知觉等形式都纳入了思维之中;其四,两项对立结构的能指—所指关系揭示了思维结构与思维背景的联系,证明,思维意义只能在其思维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得到确立或阐释出来,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主义来说,两项对立结构绝不把自身封闭在主观的语言和思维中,而是向现实开放。

詹姆逊对共时性策略的论述,一方面强调共时性的内在结构及其符号特征,以此揭示形式符号系统内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符号形式系统与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此说明形式符号的历史性、开

放性。这两个方面恰好从不同的角度补充和深化了辩证思维否定性内容。前者展示了辩证思维的内在结构和建构方式,后者展示了辩证思维是怎样在与现实的相互关系中打破体系的封闭性的。由此可见,历时性策略和共时性策略是詹姆逊的文化批判方法的两个互补的方面。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认为,哈里斯和詹姆逊研究范式在向我们展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的不同思维方式的时候,也规划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理论研究的走向:遵循哈里斯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理论研究必然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社会系统之中,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社会本体论;遵循詹姆逊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理论研究必然走向意识形态研究,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意识形态理论。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沿着这两种模式展开的。

二、哲学理论的文化阐释

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理论阐释是围绕着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其一,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传统,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与其他形态的文化哲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特有的范畴体系及其基本特点等问题;其二,马克思文化哲学的解读,包括马克思哲学能否称之为文化哲学,在何种意义上能够称之为文化哲学等问题。

1.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传统

布莱克曼承袭詹姆逊的研究思路,考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及其与解释学和心理分析哲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学和心理分析哲学是文化哲学的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依照它们对文化与统治(domination)关系的理解和对西方传统文化的态度而区分为批判的解释学和传统的解释学。传统的解释学,如伽达默尔,反对把强制和冲突作为文化的形成方式,即否认文化与统治之间的联系,并由此声称西方文化传统真正体现了无强制、无冲突理解的理念。这实际上是对西方文化传统抱以非批判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解释学被称之为非批判的解释学。与之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心理分析哲学都对西方文化传统持批判态度,在文化解释上,他们强调文化与统治的关系,认为,文化即是对统治和对冲突的社会秩序的肯定,因此,文化就是“肯定”(affirmative)和批判。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心理分析哲学都属于批判的解释学。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心理分析哲学在研究方式上又是根本不同的:心理分析哲学主要通过言谈和心理治疗来分析文化的“肯定”特征,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是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上,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来分析西方文化传统的“肯定”特征。这样,实践、经济、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文化理论的特殊范畴。布莱克曼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与解释学、心理分析哲学的文化哲学根本不同,但在其研究方法上又相互借鉴,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也正因为此而分为两类:那些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作文化现象学、解释学分析的哲学家们构成了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卢卡奇、布洛赫、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本杰明、哈贝马斯等、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西克;而那些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概念作心理学和结构主义分析的哲学家们构成了心理分析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这些哲学家中最著名的有:阿尔都塞、马尔库塞等。布莱克曼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与解释学和心理分析哲学的关系,旨在建立批判的解释学^[3](P. viii),所以,只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论述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

与布莱克曼不同,丹米柯以马克思的“劳动”范畴为尺度,考察了马克思与当代文化哲学家们在说明社会现象上的异同点,说明马克思文化哲学的特点及其对当代哲学家们的影响。首先,丹米柯考察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符号系统理论之间的关系。列维—斯特劳斯曾经明确指出,他的符号系统理论来源于马克思的反经验主义思想。丹米柯认为,尽管列维—斯特劳斯的符号结构理论得益于马克思的思想,但他的符号结构理论与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是根本不同的:(1)马克思的“劳动”之所以可看作是符号系统在于,劳动是一个变化系统,它是以价值说明劳动与商品形式的关系,而不是功利主义对自然的斗争,而列维—斯特劳斯的符号结构理论是一种思想结构,他是以内在于思想结构说明社会

活动; (2) 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是非还原论的, 即使在谈论社会历史规律时, 马克思也未采取还原主义的立场。因为马克思所说的规律仅指活动在其中发生的框架, 规律只对人的活动起制约作用, 而不起预先设定的作用。进一步, 马克思研究社会的目的也不是要发现一切文化中的不变的东西, 而是解释社会是怎样形成控制和合理地运用开发力的, 由此出发, 马克思研究上层建筑的中心是神秘事物, 即错误意识的作用, 亦即他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东西。与马克思不同, 列维—斯特劳兹说明社会和文化时采取了还原主义立场。在他看来, 一种社会理论的目的就是要把社会生活的各种表现归属于适合于一切文化的普同结构。这些普同结构就是无意识的“规则”, 而运用这些规则的人是不可能认识到的。列维—斯特劳兹运用这种普同结构去研究社会时, 就把对文化、社会的说明还原为生物的、心理学层次的说明, 把人类社会还原为自然科学。其次, 丹米柯考察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与弗洛伊德的人类学的异同。他认为, 弗洛伊德的人类学与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有共同点: (1) 弗洛伊德认识到劳动、物质必然性在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把社会生产的技术力量置于人与自然之间; (2) 弗洛伊德认识到, 正如我们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中所看到的, 人的需要、愿望随着一种复杂的文化出现而变化, 因此, 人的本质是产品, 而不是社会生活的起源。但是, 弗洛伊德的人类学与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1) 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强调人的本质的永恒变化和发展, 而弗洛伊德则最终认为像人的本质或心理基础这样的东西是社会不幸福的基础, 它不会随着更为普遍的社会变化而消失。这又否定了人的本质的发展和变化; (2) 弗洛伊德认为, 货币贮藏和艰巨劳动最终可以得到心理学的说明, 而马克思则认为, 个体的心理特征应当让位于社会的和历史的分析。此外, 丹米柯还考察了当代法国、德国其他文化哲学家高克斯(Goux)、鲍德里拉德(Baudrillard)、德勒茨(Deleuze)、格塔里(Guattari)和阿多尔诺、哈贝马斯的文化哲学与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关系。丹米柯指出, 他们都是通过吸取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成果而建立自己的文化哲学理论的, 他们理论的差别来源于他们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不同理解和阐发。丹米柯认为, 当代文化哲学的不同派别与马克思劳动理论的联系和区别, 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在当代文化哲学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 同时也表明,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全部理论应当到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中去寻找。

布克莱曼和丹米柯尽管考察的视野不同, 但是, 他们却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源流与传统, 说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必须到马克思的实践或劳动范畴中去发掘。

2. 马克思的实践的文化阐释

美国哲学家们普遍认为, 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中,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活水源头。但是, 马克思实践哲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之为文化哲学呢?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 美国哲学家们对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作了文化哲学的剖析。

丹米柯从劳动本体论的角度发掘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文化哲学蕴含。他的基本思路是, 把马克思劳动范畴的哲学意义和政治经济学意义区分开来, 肯定马克思的劳动范畴是一个本体论的范畴, 而劳动的本体论即是文化的存在。他指出: “在马克思看来, 劳动是一个哲学概念, 而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 这就意味着“在马克思那里, 劳动是关于人类活动的基本理论的一部分, 或是社会生活的本体论。”^[4] (P. 2) 作为社会生活的本体论, 劳动概念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 劳动是人类对象化活动的基本形式。在马克思看来, 劳动是一种自我对象化的活动。自我对象化的活动其实就是有目的的活动, 其特征是生命的活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第二, 对象化的活动是人的本质, 是人的类存在的一个突出表现。在马克思那里, 人的类存在不是人的自然性, 而是人的社会性, 而人的社会性就是人的文化。马克思把人的劳动区分为两种: 一种是作为人的本质活动的劳动。这是劳动的肯定意义。另一种是历史形态中的劳动, 即作为奴隶、农奴、雇用劳动者的劳动。这种劳动即是人的生产关系, 亦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形式。它的性质决定于作为人的本质劳动的性质。因为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是人的文化存在, 所以, 作为表现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的劳动便成为人的文化存在的表现方式。第三, 劳动概念不是因果存在的事件, 而是符号活动。马克思的对象化、中介等概念都包含着符号、行为意义的特征。马克思借助这些概念揭示出劳动的符号本性, 不仅超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的说明, 同时, 也超出了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说明自然、社会发展的严密逻辑理性主义, 而与现代文化哲学汇合一起。以上三层含义表明, 马克思的

劳动概念是一个说明人的类本质、人的文化存在的本体论概念。当马克思用这一概念来考察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时,就把社会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不论是劳动概念本身,还是人们的社会关系,都是人的文化存在。由此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文化哲学。

此外,丹米柯还剖析了实践的结构。他指出,马克思的实践范畴是由两个层面的内容构成的:一个层面的内容是劳动的一般规定。这种规定撇开了具体的社会形态对人的本质和存在所作的规定;另一个层面是实践活动的规定。这是结合具体的社会形态、结合社会形态的变更来谈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意义。这两层含义中,前者无疑是更基础的方面。那些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哲学家们的错误就在于局泥于具体的社会形态层面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降低到政治经济学的水平,因此,要走出这一误区,就必须深入到本体论层面来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

我们认为,丹米柯的这一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理论研究打了一个广阔的空间,特别是他把马克思的实践区分为人的本质的劳动和历史形态中的劳动两种形式的思想,使人们可以分别在本体论和历史观、抽象和具体这两个层面,或者在这两个层面的结合上阐发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文化哲学内涵,其他的美国哲学家们更多地是以具体的社会形态的实践为重心阐发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文化哲学内涵。

杜帕从文化即人化、自然化等规定出发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范畴,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即人化、自然化、社会化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就是人的存在方式。这就意味着,实践是以文化创造活动来规定人的存在的范畴。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之为文化哲学的范畴。但是,马克思从来不把实践范畴从人们的现实活动中抽象出来,使它变成一个超越具体社会形态的、抽象的理论范畴,他甚至明确地反对有一种独立于人们的现实活动和现实的社会形态的实践理论,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实践首先是一个表达人的总体活动的范畴,包括人对自然的作用,由于分工而产生的人与人的相互作用关系、生产、科学、艺术、意识形态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分工和生产是最基本的活动;其次,马克思还把这种活动置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中加以考察,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于是,异化就成为了马克思实践范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这一内容构成了马克思的否定的辩证法^[5](P.4-5)。杜帕强调,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是相互规定的:由于分工和生产活动的规定,否定辩证法获得了社会物质生产及历史过程的内容,而不致成为抽象的公式;而实践的分工和生产活动的内容因为具有否定辩证法的规定而超越了经济目的的限制,具有了哲学的意义。马克思通过这两个方面的相互规定,把社会经济活动与否定的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经验的层面上建立起了实践理性,从而批判了古希腊以来的理性逻各斯传统,从而导致了西方哲学的意识、个体性、理性等哲学范畴的重新解释和各种哲学问题的重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没有看到马克思实践范畴中关于分工和生产的的规定性,而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解释成一种抽象的社会结构,否定了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关于社会动力的学说;“辩证唯物主义”否定了马克思实践范畴中的异化和否定辩证法的规定,而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简单地解释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却没有看到马克思实践范畴中论及的分工、生产活动与文化的联系,以及由此引起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变革。

布克莱曼从他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主张从历史和评价两个层面上理解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文化内涵:在历史层面上,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以区分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为基础,以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和意识形态等概念为主线研究人的实践活动。在这一层面上,马克思通过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提出了人的实践的三个规定性:其一,人的生命在每一历史阶段上都是社会的活动、社会的存在;其二,私有制是人类历史的特殊阶段。在这一阶段上,出现了人的个体性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三,资本主义构造了人的异化存在,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克服异化现象^[3](P.70)。根据这三个规定,马克思的实践活动既具有现实的物质性,也具有强烈的乌托邦精神,而后者决定了马克思实践的批判性特征,构成了实践的价值评价标准。与历史层面的实践规定相一致,马克思的实践评价活动是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的:其一,对物质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冲突及发展方式的评价;其二,对物质生产过程中参与主体的评价;其三,评价具体阶段的物质生产活动对于人类历史进步的意义。这些评价就构成了社会的文化批判。在这两个层面中,布克莱曼更重视实践评价的意义。

在他看来,正是评价,体现了马克思的乌托邦精神的价值,表现了马克思是如何开展工业文化批判的,所以说,评价活动是马克思文化哲学的批判性的充分表现,而实践的历史内容只是评价的认识论背景。

布克莱曼强调评价的重要性,是力图在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具体的、历史的内容中发现一种超现实的文化理性。这一思路,在理论建构上,与丹米柯区分人的本质的劳动与社会形态的劳动的思路有其一致性,但是,他们建构理论的方向是根本不同的:丹米柯区分两种劳动是要建立马克思哲学的文化本体论,而布克莱曼则是以评价的参与而否定本体论;丹米柯建立的马克思文化哲学是说明性的,而布克莱曼建立的马克思文化哲学是批判性的。他们的差别体现了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不同走向。

三、多元化的理论走向

从研究范式的重构到哲学理论的文化阐释,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研究始终都是沿着建构和批判两极展开:沿着建构的一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研究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建构;沿着批判一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研究走向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对女性主义的文化反思。这两极四个方面的研究构成了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的多元理论走向。

在本体论方面,美国哲学家们通过考察马克思实践的文化内涵,提出了个体性与共同体的关系、人的创造性活动与人类历史、经济与文化符号、异化与意识形态等问题。文化哲学本体论的重建就是通过马克思劳动范畴阐发这些问题,并以劳动打通这些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丹米柯的《马克思与文化哲学》、杜帕的《马克思的文化的社会批判》、古德的《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论中的个体和共同体》等。

在认识论方面,哈里斯的研究方向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哈里斯把研究范式当做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建构的主要内容,并力图通过认识论的研究建立一种具有经验科学性质的唯物主义学说。这一研究方向导致了美国哲学家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建构。美国哲学家们主要吸取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成果,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当做一种以生产为基础的发生认识论来研究。美国哲学家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生认识论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一样,都是一种经验的科学,而不是意识形态,与皮亚杰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发生认识论不是以人的知觉结构的形成,而是以经济的符号或社会结构的形成为主线,探讨个体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这也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有别于波兰尼的认识论。这一方面的成果除了哈里斯的《文化的唯物主义:为文化科学而斗争》外,还有 M. 瓦托夫斯基的《原型—表现和科学理解》、《从发生认识论到历史认识论:康德、马克思、皮亚杰》、斯坦利·戴蒙德(Stanley Diamond)主编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问题与前景》。

现代性批判和后现代的研究是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最突出的方面。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后现代的起源》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思潮作了起源的考察和评论,苏珊·巴克-莫尔斯(Susan Buck-Morss)的《视觉辩证法》以视觉认识的研究开展了对工业文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大众文化批判,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后现代的条件》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的变化探讨后现代性的问题。这些研究成果体现了美国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走向。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女性主义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中最重要内容。女性主义的文化哲学研究与传统的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不同特点,就是从社会性别角度考察女性主义问题,除此之外,美国的女性主义研究还特别注意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考察女性中存在的阶级和种族问题。在这个领域,最重要的著作是 M. 瓦托夫斯基主编的《妇女和哲学——走向一种解放的理论》。这部著作收录了当时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妇女问题研究的最有影响的文章,如古德的论文:《妇女问题:解放的哲学和哲学的解放》、V. 海爾特的《马克思、性别和社会转型》等。此外,伯特·奥曼(Bertell Ollman)的《社会 and 性别革命》尤其值得重视。在这部著作中,奥曼突破了其他哲学家们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探讨性别问题的视域,把性别问题当做整个人类文明的问题加以探讨,以性别研究深化到

日常生活文化批判之中,从而把性别革命与社会革命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加以探讨。

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多元理论走向是一个事实,但是,从这一事实中,我们还是可以把握这些理论的共同点:即以生产活动为哲学的经验基础,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社会批判,寻求人的文化解放和个体自由。这一共同点构成了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的主线。

[参 考 文 献]

- [1] Harris, Marvin. *Cultural Materialism: The struggle for a science of Culture*[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1980.
- [2]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语言的牢笼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 北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
- [3] Brenkman, John. *Cultural and Domination*[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4] D' Amico, Robert. *Marx and Philosophy of Culture*[M].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81.
- [5] Dupré, Louis. *Marx's Social Critique of Cultur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责任编辑 严 真)

U.S. *Cultural Materialism* & It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HE P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HE Ping (1953-), female, Doctor,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y of culture.

Abstract: *Cultural Materialism* belongs to the form of the American Marxist philosophy of Culture. It is founded through two different ways: the one is, with the aid of the achieve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empirical philosophy of culture which is based on the economy and everyday life; the other is, drawing paradigms from European critical Marxist philosophy, critical philosophy of culture which is based on the meaning of languages and ideology. This paper focus on making the researching on the leading philosophers of the two kinds of philosophy of culture and their concep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ing paradigms, sorting out the traditions of Marxist philosophy of culture and expounding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Marx's practice, and reveals the pluralistic developments of the theory of American Marxist philosophy of culture.

Key words: American philosophy; American Marxism; Marxist philosophy; philosophy of culture; cultural materialism